

进了嘴里。黄油烙饼是甜的，眼泪是咸的”（《黄油烙饼》）。汪老的笔下、心中都是摇曳多姿的生命个体。其一生，坎坷颠沛，哀而不伤，悲天悯人。汪曾祺自称“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（《我是一个中国人》）。

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”，是汪氏悼念沈从文先生的。“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、含情的微笑，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。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，得失荣辱，全置度外，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，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。”写沈先生，何尝不是对着镜子看自己，借汪氏自己的话，“这是蒿然仁者之言”。这样的文人总是想到别人。

全身癖好、用情极深、一片赤诚是汪曾祺人格光芒。讨论小说，也在说着自己：“我以为小说是回忆。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，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，除净火气，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，这样才能形成小说。小说是谈生活，不是编故事；小说要真诚，不能耍花招。小说当然要讲技巧，但是：修辞立其诚。”（《〈桥边小说〉后记》）

立其诚，人生、感情、待人接物又何尝不是呢？

汪老天分高，天性散，对政治疏离，却一度和政治靠得过近，还因《沙家浜》成功上了天安门；“文革”结束，被晾了两年，写了17万字的交待材料，划清界限。大家印象是，“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，从里到外都比较纯，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”。

“文革”遭遇，不经意间汪老有了戏剧、文学双高峰。但为此他

净心是他一生践行的“不着急”，忠于所学、所思，生活的真谛。

想轻生，要砍掉手指表明心志，他终究成了那个贪吃、贪玩、贪恋世间一切可爱风景的老人，所谓妙才。

精神的启示


好的作品除了真美，“还有一种引人‘向善’的力量，对人生，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”（《又读〈边城〉》），这是老师沈从文所思，更是汪曾祺汲取的最大营养。学者翟业军曾经写道，“沈从文的‘善’的着重点不在济世，而是要让读者从作品中得到启示”（《蒿然仁者辩》）。这也是汪老的文字与人格的核心所在——文章之效，滋润而非疗救。不在于济世，而关乎净心，或者静心。

淡和俗是汪氏的审美趣味。脱俗又世俗，脱俗是精神追求，世俗则贪恋这世间一切美好：赏心悦目，大快朵颐，饱览五色，遍尝

奇珍。这和如今狂飙突进，效率优先并不相称；他的精神气质也是反崇高、反英雄、反恢宏的格局，有着儒与道的反哺，但也少“匹夫有责”“铁肩道义”的情怀，是缺点，也是特点。

向善首先有纯心，或童心。和丰子恺一样，汪曾祺骨子里返璞归真，文学的极致都是儿童文学的倾向，打破一切规矩、束缚、界限和框架。所以他“欣赏孟子的‘大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’”（《我是一个中国人》）。汪老想起父亲的绝顶聪明也很随和，和儿子关系不错，“我的孩子有时叫我‘爸’，有时叫我‘老头子’！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‘没大没小’。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、充满人情味的家庭，首先必须做到‘没大没小’。另外作为一个父亲，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”（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）。

净心是他一生践行的“不着急”，忠于所学、所思，生活的真谛。他念旧又长情，字里行间，皆是故乡、故人——高邮的鸭蛋与茶干，扬州的酱园和剃头匠，昆明的牛肝菌，北京的咸菜，后研究宋朝人吃喝，自创“塞馅回锅油条”。行文似与人聊天，长短错落，闲说着话，含蓄隽永，口齿留香。白话的传统来自老乡柳敬亭。每多读一分，就对这世间多一份理解和热爱。

所以，汪老说，“追随时尚的作家，就会为时尚所抛弃”。

下图：《汪曾祺全集》。

